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6czw018) 优秀结项成果

周保欣◎著

伦理视野中的 中国当代文学



 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czw018）优秀结项成果

周保欣◎著

伦理视野中的 中国当代文学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周保欣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01-011549-8

I. ①伦…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511 号

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LUNLI SHIYEZHONG DE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周保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286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549-8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引言

从伦理的角度观照当代文学,意味着这样一种辩证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我们必须论述到文学对伦理的叙述;另一方面,伦理的思想意理,将作为我们批判和反省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视点。在这里,这样三个概念是必须要首先辨识清楚的,那就是本书对“当代文学”、“伦理”、“道德”等诸概念的使用问题。所谓“当代文学”,本书所指的并非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而主要是择取“新时期”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段作为论述对象,当然是因为这个时段的文学深植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现代性变革之中,其间充满着丰饶的变化和“丰富的痛苦”。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社会而言,显然是具有历史“拐点”意义的。

而所谓的“伦理”和“道德”,亦须稍加辨识。从词源学上看,伦理与道德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伦理意在强调维持人们人伦关系而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而道德则突出的是作为宇宙整体秩序的“道”对人的内心约束。伦理与道德各有侧重,前者偏重外部他律,后者突出实践性的主体自律。^①但从文学创作角度言之,伦理或道德表述实难作内外区分。作家之创作,既关涉到外在的伦理规范,同时也有内在的心性主体的道德诉求。因此,在我这本书的相关描述中,伦理与道德将是交叉使用的,两者间的语义差别均通过具体的文本语境呈现,而不是明确的概念上的辨识。

伦理与文学或者说文学与伦理的关系,早就是文学研究的老话题。在这个人们对学术创新趋之若鹜的时代,这样的话题恐怕很难再激发起人们

^① 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的兴趣。尽管我们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和评价,都不可能真正地绕开伦理的存在,不可能绕开道德这样的思想维度,但是,我们对于道德的感兴,更多的还是出自某种情感化的直观表达,真正从学理上把它们作为学术研究的视角,通盘思考当下文学创作之是非得失的,则不多见。从近些年来来的学术研究情况看,由伦理和道德角度切入当代文学作较为集中研究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何西来、杜书瀛诸先生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新时期文学的道德研究。那个时候,国内的市场经济日渐成形,公共道德领域出现某种“剪刀差”,一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新的道德生活、道德现象逐渐抬头,一边是精英知识分子的“道德高地”暂时还没有失守;两相碰撞,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由此而拉开序幕,搅得文坛风生水起、扑朔迷离,“王朔现象”、“《废都》现象”、“‘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与‘二张’之争”,等等,这些讨论或者说论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道德问题展开的。另一种则是谢有顺、王鸿生、耿占春等诸君的“叙事伦理”批评。和伦理叙事研究不同,叙事伦理批评强调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它的“应然”的伦理使命与道德关怀。研究者侧重的是从文学的经验世界出发,钩沉文学对道德生活的“讲法”。谢有顺有言:“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① 这段话表明,他们的叙事伦理批评的根本趣味是在叙事,而不在作为叙述对象的道德。国内的文学叙事伦理批评,多有受惠于刘小枫先生的理论,他在《沉重的肉身》里,提出“人民叙事伦理”与“自由叙事伦理”概念,对于叙事伦理批评理论、方法的兴起,有引导、兴发之功。

在这本书中,我的主要工作和研究目标,就是通过对当代作家创作中涉及的各种伦理现象和道德现象的观察,推论作家们叙述各种伦理道德现象时,他们内在的伦理关切、道德意识、态度、情感与道德价值取向以及这些精神、情感因素与时代、历史、文化之间呈现出的共振关系,辨识作家们的文学叙述所呈现出的特殊历史、时代与个体美学况味。

伦理也好,道德也罢,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不是由概念、德目、道德

^① 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南方文坛》2005 年 4 期。

理想等组成的单纯观念世界,而是我们的具体存在,道德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是人们“活”出来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当然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不道德”。所有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论辩,都是与特定的地域、民族、历史与现实等外部条件相联系的。道德的真理性 and 它的实践性,会随着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伦理诉求、道德疑问与道德关切,这是每个时代不可重复、不可取代的特殊性所在。文学亦复如此。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道德难题,都有自己需要回应的道德疑问,因此,无论是研究伦理视野下的文学状况,还是文学的伦理叙述状况,都没有所谓的“新”与“旧”之分,而是随着时代与生活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聚焦点和聚焦方式。

当然,这只是从伦理的层面来理解的。如果从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殊传统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就中国文学而言,我们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文学在审美、娱乐功能之外,还有风化社会、陶冶人心的“诗教”担当。中国文学从何时始,又是如何形成“诗教”传统的,这里不去讨论,单就孔子“删诗”之说,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修辞立其诚”等立论来看,就足可见“诗教”传统的源远流长。和这种传统相吻合,中国文学尤为重视思想、道德、情操、品质、气节等“内容”层面的文学元素,这与西方文学较为突出叙事、结构、修辞、情节、冲突等“形式”性要素截然不同。道德作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中国文论的重要典律。自古至今,中国诗论家谈文论艺、臧否人物、评价作家作品的好坏,“知人论世”式的道德评判通吃一切。正是因为突出文学的教化与道德训诫功能,中国文学一方面形成“言志”与“抒情”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则极为注意把自然、客观事物作道德上的对象化处理,故而,梅、兰、竹、菊等皆着上道德与品质之色。

中国文学深厚的伦理底色,并非是简单的民族好恶问题,而是与传统文化的构成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自古至今,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无外乎“宗教”、“法”、“伦理”三种力量。在西方社会,这三种调节性力量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呈三足鼎立之势,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固,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即便出现伦理规范的解体或者说道德的崩解,至少从理论上讲,尚不至于

出现大的问题,因为这不过是三足断其一而已,道德之外,它们还有宗教与法起到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法的意识较为单薄,宗教亦未有充分的发展,在西方社会很多由法和宗教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都是由伦理来维持的。所以,伦理在中国可以说既是擎天一柱,也是文化之轴心。中国社会的道德系统一旦出现问题,则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小则人心变乱、人性陷溺乃至恶行流布;大则会引发种种社会危机甚至是天下大乱。正是如此,诸如“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历来都是中国人最恐惧的文化景象。历代的王朝异姓、江山易主,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道德修辞和伦理推手。

伦理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历朝历代,人们都把道德宣示、道德规训、道德担当视作文学的核心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伦理的视野观察我们的当代文学经验,或者说以文学为标本,释读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既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又是非常紧要的问题。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承认,改革开放这三十余年来,我们在物质与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道德生活领域,我们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诚信丧失、私德偏废、公德不立、族群矛盾尖锐、阶层冲突加剧、有毒食品泛滥、贪腐猖獗、公权力肆无忌惮,等等,这些是当下人们非议最多的问题。伦理规范的失效与道德的破产,不仅引发了人们生活上的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危机。古人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何以我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时候,却会出现社会性的大面积道德溃败?经济发展能否改善我们的道德面貌?这些问题虽说不是文学研究者能够回答得了的,但如果文学研究绕开社会道德的现实问题,这无疑也是不负责任的。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论及当代中国的伦理现状时,多把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似乎市场(商品)经济就是道德麻烦的罪魁祸首,这很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并非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发展模式。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引发中国社会道德破产的主要原因,那么,像英、美、法、德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几百年,是不是应该遭遇到比中国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恐怕是很难作具体判断的。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我们必须承认,

改革开放确立的商品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的确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瓦解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改变了传统农耕社会那种族聚而居的生活方式和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们的问题却不在发展商品经济本身,而在于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我们缺乏足够的道德思想资源来理顺、调节和制约商品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道德破坏性与冲击力。以大历史的眼光看,“五四”至今,反传统与现代化构成了我们文化发展的主流。因为传统文化被预设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故而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不同程度存在着一种现代怨恨心理。在一系列的反传统或者说是“反封建”的文化行动中,传统道德资源与当下在“明言”的层面上发生了短路。同时,我们对西方为代表的现代道德文明,尽管不乏羡慕,但却绝非是兴高采烈的“拿来主义”,而是怀有一种殖民主义记忆的怀恨接受;我们所“拿”进来的西方伦理价值,又多因水土不服而沦为空头支票或者是花瓶式的思想摆设。新中国成立以后,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新伦理,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还不足以占据人们的全部思想。正因如此,当商品社会如疾风带雨般地冲刷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传统道德思想被弱化,西方道德思想进不来,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又很难发挥它的思想效能,这样,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的真空中,没有足够的精神支援来化解商品经济社会带来的道德暴戾之气。

对当代中国社会作道德分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观念与制度、集体与个人等,多重合力造成当下中国的道德事实,任何简单、片面的分析,都有可能对事物本然的遮蔽。台湾学者韦政通曾经这样指出:“一个有悠久传统的社会,在它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上的一个理想情况,应该是传统价值观念与逐渐抬头的新价值之间能相互融合,这样一方面不致陷入心理上无所归属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可使新的价值指南在渐变中达到价值更新的目的”。^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道德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麻烦或许就在于,我们正处在一个规范重建与道德价值重组的关键时期,然而,我们却缺乏一种确定的道德价值系统来解决我们的“心理归属”问题。如果更进一步思考,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中“法”意识的

^① 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0 页。

贫乏、宗教罪感意识的空缺,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你批我、我斗你、你揭发我、我暗算你的人性扭曲行为等,都对今天的道德现状有型塑作用。这些负面的道德遗产,就是装在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在政治至上的年代里,政治高压有可能压迫着它们,使它们无法现身,而进入商品社会以后,随着政治的“所罗门瓶盖”最终松动,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与逐利原则,加剧着我们内心深处不守规则、伪善、自私、狡猾、贪婪、残忍、不当攫取等潮湿、阴暗的一面。——商品经济不是魔鬼的生产商,而是它的显影剂。

一个民族愈是古老,它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重组就愈加艰难,就会遭遇到更多的痛苦和不适。如何解决当下中国的道德不适,当下中国社会如何通过重建“中国道德”而构造出“道德中国”,这些或许都不是我要关心的。我所研究的毕竟是文学而非道德,因此我的命意所在,还是通过对生活、世界、作家、作品的互动、互生关系的把握,突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产关系当中。我重点要思考的是:当下道德状况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和叙事语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具体地说,作家们叙述出怎样的伦理?他们是如何叙述的?为何这样或那样叙述?作家们叙述行为背后隐匿着怎样的文化、历史与现实“风景”?作家们的伦理叙述和叙述伦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文学理想的叙述立场、叙述方式是什么?在文学叙事传统中,当代作家的伦理叙述与传统文学有着什么样的隐秘联系?两种经验可否互证与展开对话?等等。

本书的写作,我的基本思路可归结如下:

首先,当代中国的道德问题和文学都不是孤立的岛屿,而是深植在社会变革的历史逻辑之中的。20世纪以来,中西古今的冲突、融汇与贯通,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领域都演化出许多命题。因此,在论及当代文学的道德问题时,我的一个基本视域,就是把当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放在现代变革的大逻辑中,在现代与当代的汇通中,去勘探作家道德叙事的来龙去脉。尽管我所讨论的是“当代文学”,但很多时候,我会涉及“现代文学”,因为无论怎么说,“当代”是从“现代”来的,没有“现代”何来“当代”?当代文学中的许多写作现象,与现代文学不过是流与源的关系而已。我们只有追本溯源、正本清源,才能对当代作家的道德叙事有一个历史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其次,我对当代文学的论述还有另外两个参照,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和

西方文学。古典文学是当代文学的根。“五四”以来,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中西的碰撞与冲突。和中、西文学之间的交流与汇通相比,我们对现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关系谈得比较少。这种古今的断裂,对中国文学的建设和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在经历百年的中西冲突、融汇与贯通之后,当前中国文学正面临着一种写作经验、美学思想的重塑与选择。作为“中国的”文学,我们要想凝练出自己的特色,在师法西方的同时,如何“寻根”也是一个问题,如何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保持连接、对话与沟通关系,这是从文学创作到理论批评都应该要思考的。正是这样,我在把握当代文学的道德叙事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把中西文学放在互为参照的位置,把当代文学放置在中国文学大历史 and 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诊断式地观察当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利弊得失,参详当代文学道德叙事对传统美学的赓续、突破与创新。

再次,在道德的历史普遍性与时代特殊性之间,我尤为关切的是作家道德叙事的时代特殊性。从文学本体意义上看,人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一般都是指向道德特殊性的。能否敏锐感知到时代的脉动,抓住时代的道德特殊性,这是考量一个作家审美智慧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标尺。人类文学史上,许多经典名著在问世之初,往往都因为写到了一种难以为彼时人们接受的道德特殊性,而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郁达夫的《沉沦》,等等,然时过境迁之后,恰恰是那些“不道德”的作品,却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我认为,真正有力量和审美穿透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那些敢于穿越思想禁区,敢于在“不道德”中发现道德,敢于在人们普遍尊崇的“道德法则”中发现“不道德”的作家才能写出来。如果一个作家,只能以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去描绘、歌颂或者批判现实生活与生活中的人性,那么,这样的作家虽不能说一定就是一个庸才,但至少是缺乏道德创新的作家。好的作家未必会给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道德难题,但他一定会在创作中给我们提出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道德疑问与道德难题,从而给人以启迪。

最后,既是一部关于当代文学道德叙事研究的书,那么就难免会涉及对作家、作品和各种创作现象、作家创作意识以及作品中涉及的社会现象与人生现象的道德评判。一个问题就油然而生:本书评判的基本道德立场

是什么？什么是我的“元道德”？这里必须要有所说明，我并没有所谓的“元道德”，原因很简单，所有的道德德目——无论是西式的还是中国传统的，都依赖一定的时间、空间、地点、文化等条件而存在。“橘逾淮为枳”，在这里为道德的，因时空转换，在彼可能就是不道德的。这样的现象我们所见甚多。故此，在我的描述与判断中，我不大会以抽象的德目作为我的评判指标，更多的时候，我是以两点作为我把握的基准：第一，就是作家叙述到的事件、行为、生活现象、社会与人生现象，是否有助于提高生命个体的内心之善与社会公共之善的建立，是否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与自我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人性的提升。第二，就是作家的道德叙事，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有何突破、创新，对文学自身体式方面有何创化的意义。

在全书的基本构架上，我主要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包括第一至第八章，主要是以家族叙事、乡土叙事、底层叙事、革命叙事、宗教叙事、官场叙事、生态叙事、两性叙事这几个当代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叙事形态作为分析的类型和范本，揭示当代作家在不同题材和审美领域，伦理叙述的成就、经验与问题。就研究的整体趋向而言，我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一种“反思”意识，更多的是侧重从“问题”出发，对当代文学的成就、经验与问题作出历史的分析与评判，探究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与文学自身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下编主要从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建立、当代文学的“善恶之辨”、作家的“文学性”诉求与道德书写、网络文学的叙事伦理问题、80后作家的边缘化伦理书写现象、当代文学的传统道德现代化书写、十七年时期道德叙事的“风俗化”现象的启发、当代文学社会共同伦理建构与国家价值观构造等方面，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个案与整体的结合、创作现象与文学史现象的结合，把当代文学放在一个发展的链条上，在历史的转换之中，去看看那些转瞬即逝或者永恒的“风景”。结语部分，我着重探讨的是文学自身创新与道德创新的关系。我的命意之所在，是想以自己的思考去逼近我们这个文学时代，触摸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肌理，虽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学术言述，却未敢妄想去“解决”什么问题。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编 伦理视域与文学创作类型阐释

第一章 家族叙事:历史、文化与人的伦理审思	(3)
一、历史叙述与历史的道德基础	(4)
二、家族文化:伦理批判与批判的反思	(9)
三、“个人”逸出与“社会人”伦理	(13)
第二章 乡土叙事:“冲突”美学与道德难度	(19)
一、城乡冲突与“发展”的道德	(20)
二、物质主义与“跛足”的启蒙	(24)
三、城乡善恶书写的复杂心理地形	(29)
第三章 底层叙事:左翼美学的诗学正义与困境	(36)
一、批判美学与道德的单极书写	(36)
二、视点匮乏与泛道德主义	(42)
三、底层写作的道德与美学前景	(47)
第四章 革命叙事:道德革命与“革命”的道德	(57)
一、“身体”:革命伦理的修辞与辩难	(58)
二、“人性中心论”:道德革命及其问题	(62)

三、“史识”与“史心”：回归真正人道主义	(68)
第五章 官场叙事：政治伦理与人性道德政治	(73)
一、政治伦理与官场道德	(74)
二、官场的人性与道德政治	(79)
三、官场的道德与政治文化	(83)
第六章 宗教叙事：伦理救度与价值错位	(88)
一、“属灵”与“属心”：人与神的对峙	(90)
二、“人类爱”、“现实恨”与“宗教爱”	(95)
三、神本与人本：作为一种写作的道德	(99)
第七章 生态叙事：狼现象与现代“心力”伦理	(106)
一、文学历史结构中的“心力”叙事	(106)
二、“狼性哲学”与“心力”的伦理反思	(113)
三、“人性”与“狼性”的人文辩证	(118)
第八章 两性叙事：文化抗辩的伦理与美学问题	(123)
一、深渊体验与性别道德抗辩	(123)
二、女性文学的“激情”伦理	(128)
三、女性书写与人类整体意识	(134)
 下编 伦理视域与文学发展理论反思	
第九章 伦理文化与文学的“中国性”	(141)
一、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学的伦理内质	(141)
二、伦理文化与审美意识形态	(145)

三、伦理文化与文学“问题”	(149)
第十章 “恶欲叙事”:历史修辞与意义迷失	(154)
一、“现代恶”及其叙事形态	(155)
二、启蒙预设与“恶”的历史修辞	(162)
三、恶欲叙事的意义迷失	(166)
四、恶欲:人的“习惯性轻蔑”	(171)
第十一章 “文学性”:道德审美位移与悖谬	(175)
一、道德悬置:虚无主义与“先锋”的遗产	(176)
二、“生命至上”:道德掩护下的迷乱与狂欢	(180)
三、苦乐叙事:受苦的道德及其文学意义	(184)
第十二章 网络写作:文学“常变”中的叙事伦理	(190)
一、民间起源与文学“底层结构”重建	(191)
二、“娱乐性”的文学叙事伦理正名	(196)
三、道德自由与自由的道德	(200)
第十三章 “无根据颂”与“80 后”作家的边际伦理	(206)
一、整体性破碎与边际化的文学处境	(207)
二、边际性写作与边际化伦理	(211)
三、“80 后”写作:正典化及其可能	(215)
第十四章 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文学问题	(220)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道德的意义	(220)
二、启蒙的意理:线性哲学与“传统”的叙述语法	(223)
三、启蒙的悖谬:“传统”误读与价值延搁	(228)

四、新启蒙与传统道德的当代问题·····	(234)
第十五章 “社会主义文学”与“风俗化”叙事伦理 ·····	(240)
一、道德“不正确”与叙事非正当·····	(241)
二、“斗争”美学与“我们”叙事·····	(246)
三、“乡村”的政治与道德神话·····	(250)
第十六章 国家价值观:文学共同伦理与当代认同 ·····	(255)
一、国家价值观与文学的当代问题·····	(256)
二、文学领域国家价值观的“沙化”·····	(261)
三、共同伦理解体与“仇恨”美学·····	(266)
四、国家价值观的审美重建·····	(271)
结语:新世纪文学与当代道德创新 ·····	(276)
一、文学史经验与道德创新·····	(276)
二、道德创新的“问题”与“方法”·····	(279)
三、道德创新与文学创新·····	(284)
参考文献 ·····	(288)
寻找隐秘的河流(代后记) ·····	(291)

第一章 家族叙事：历史、文化 与人的伦理审思

家族小说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写作现象之一。无论是牵涉到的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小说的体式、规模与艺术质量，都是其他类型的小说难以与之相比的。家族小说的兴盛，与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它不仅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日常的政治、经济与伦理关系，还在宗教意义上给人们提供了终极价值和道德信仰。钱穆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 这样的判断是非常中肯的。因为家族对中国社会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此家族的衰落，必然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强烈的震荡；而家族衰落所释放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心灵情感信息，也是文学难以抵御的素材诱惑，作家们既可在宏阔的背景中书写历史之沧桑，亦可在历史缝隙间触摸人性之冷暖，感察人生之恒常与无常。如此，家族书写在 20 世纪至今才会长盛不衰。

就现当代作家家族叙事的原初意识来看，不外是启蒙式的文化叙述、现代史式的革命叙述与哲学式的生命叙述三种方法。如此“讲法”的形成，均有其内在的思想与文学史的合理逻辑。不过，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这些“讲法”尚需在伦理上得到反思。因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叙述，这些“讲法”虽有其洞见，但总难免也有它的“盲目”之处。特别是在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第 51 页。